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
总顾问:成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原总后勤部政委、上将军衔)
编委:管益忻 陈宇 黄文夫 赵红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编委会副主任:陈宇
主编:管益忻 副主编:白卫星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陈佳贵
迟福林 戴园晨 范恒山 樊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胡代光
黄范章 贾康 江春泽 金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宗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杰 吴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经济学家

第6期(总第108期) 2013年2月16日 星期六 癸巳年 一月初七

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2013 首都经济管理学界新春联谊会”在京举行

■ 启文

日前,由《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企业战略专业委员会、星泉湾国际俱乐部等单位联合举办的“2013 首都经济管理学界新春联谊会”在北京举行。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著名经济、管理学家,《经济学家》周报总顾问成思危,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总后勤部原政委、本报高级顾问张文台上将,中国商业文化创始人、原商业部部长、原特区办主任胡平,建设部原副部长、中科院及工程院院士周干峙,中央军委办公厅原副主任徐长友将军,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保育钧,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西部发展促进会理事长程路,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沈建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经济研究所谢明干研究员,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张国有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原常务副院长宋养琰教授,国家行政学院研究中心主任丁茂战主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司长顾永高,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福垣研究员,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原司长江春泽研究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工经系原主任邓荣霖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书记刘涛雄教授,清华大学吴剑平教授,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赵红教授,中华工商时报原总编辑黄文夫等 10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联谊会。

成思危就学者的作用提出了四个观点:第一,探讨理论基础;第二,借鉴国际经验;第三,完善政策框架;第四,分析政策实施的难点。他从学者的四大作用和责任分别展开了阐述。他说,当前中国社会面临很多严峻的问题需要执政党去解决,作为官员来说,他可能没有充分的时间去仔细研究这些问题,作为学者,就应该从理论的深度和高度去深入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学者的第二个责任就是要借鉴国际经验,有责任把世界各国的经验加以分析、比较,提出自己的看法,供领导决策参考。第三个责任是要补充和完善这些政府的政策框架。比如

房改,按照当时的设想,就是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加商品房三个层次。但是,由于跟经济适用房相关的政策规定得不细,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也使经济适用房分配领域成为腐败高发区。其实,有了经济适用房这么一个政策框架,相关的分配条件、管理办法等等,都得完善。政策制定者往往考虑不到这么细,就需要学者通过调研提出建议来完善。学者的第四个作用,就是要分析政策实施的难点。任何一个政策,它在实施过程中都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学者就有必要去分析这些难点,提出可行的应对之策。

张文台上将着重就发展市场经济和强化社会道德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从辩证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为讲道德提供物质基础,没有物质基础讲道德是讲不了的。但相反,思想道德又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的很大一个问题是在转向以市场经济为中心以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所以说,物质生活改善了,但是思想政治工作重视不够。另外,还忽视了基层的一些建设,矛盾不是化解了,而是都推到中央来了,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应该认真去思考市场经济到底如何与思想道德有机结合起来,不能什么都货币化、市场化。

胡平就如何实现商业化的强国梦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商业化的强国梦也是实践中的一种创造。中国梦实际上是一个商业文化的强国梦,也是中华文化的强国梦。这个梦如何实现,要分三步走,在时间节点上与建党 100 周年、建国 100 周年和改革开放 100 周年相吻合。第一步,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同时,推动文化产业的升级;第二步,在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同时,抓好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融合、创新和超越;第三步,实现全面超越,文化取得在世界的领先地位。

周干峙指出:城市化不可太快。十八大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城市化改成“城镇化”。城市化是早在 1880 年代由欧洲、德国学者提出来的。他们研究了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我们中国革命是从农村起来的,很重视农村。长期以来是城市建设欠账。1980 年我们提出城市化问题,当时写过一个报告,强调中国必须要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报给国家计委没有回应。直到 1990 年,才从红头文件



里面见到“城市化”三个字。现在,“城市化”又热得不得了,有很多争论,看法不一的,而中央的提法就是“积极稳妥”四个字。

著名学者宋养琰、周干峙、保育钧、程路、徐长友、刘福垣、张汉亚、邓荣霖、张国有、丁茂战等先后就改革红利问题、城镇化问题、投资问题、民营经济问题等做了精彩的发言。

本报主编管益忻教授在致辞中提到,自 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走过了几个阶段,先是急剧应对危机搞大投资(四万亿);尔后,半自觉半主动地转向稳增长;至今——特别是 2013 年以后我们要着重提高 GDP 质量,要以稳妥地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为根本动力,加大改革红利和重大理论实践的探索,要进一步从理论制高点上、从事物发展之必然性逻辑上进行探讨,作出科学解说,从而更加具体、有效地发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本报将于近期陆续刊登各位专家的发言,敬请关注。)

探究道路自信的理论根据

■ 管益忻

现在,中国举国上下都在探讨经济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谋发展的新路径,对这个问题,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从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大致可划分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2008 年到 2010 年,这一阶段有人叫作“大四万亿”,这个话不一定太准,但可作参考。这段时间我国在西方世界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一方面我们不得不从外需为主转到内需为主,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发展导向,表现在三驾马车的关系上,就主要转化为投资主导了(消费主导当然谈不上),于是出来个“四万亿”。现在静下心来想想,四万亿的出现一方面是被动的,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另一方面或许也有一点我们主动调适理念的生出。现在看来,这点主动的理念非常宝贵,就是我们开始摸索到一点什么。能够这样做,一方面确实有计划经济的影响。我们的计划经济有个特点,就是高积累、低消费。但是另一方面也确实是我们有一个比较殷实的基础,家底雄厚了。比如说直到今天,美国的债务相当于它的 GDP 的 314%,我们中国就没有这样。这不是说我们地方没有欠债,有的地方欠得还不少啊,但是总体来讲我们绝没有那么严重。

从中可能学到点什么,还表现在第二阶段的实践,就是 2010 年—2011 年末,这个阶段开始注意 GDP 的质量。但是,这个阶段总的来讲,大概相当于有些人讲的叫做稳增长。开始提出稳增长阶段的时候,严格来讲也是被动的,不是主动做出来的,一说稳增长好多人还想不通。有些人老想快,开始好像也觉得应该在追求 GDP 的速度让位于追求 GDP 的质量。但是由于传统影响,总是“快”字当头,最后感觉这样不行,就变过来,使“又快又好”才变成了“又好又快”。整个阶段从“又快又好”变成“又好又快”是一个重大转变,不再把数量看得那么重要。稳增长之“稳”在强调效益、质量实则是增长方式,特别是发展方式转型。

根本转变增长方式,发展模式最终引向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出来了。从 2011 年末或 2012 年初这个时候开始,稳增长转向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就显得比较明白了,不是说前面没有重视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但是那个时候的重视不像现在这么重视——当作根本动力。这时,从三驾马车上来说,消费之重要被人们空前关注了。有人说,如果

一个农民从农村到了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其消费可能提高 8 倍。这个推算可能有水分,但的确是广大农民群众热切盼望城市化,急切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并不是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存在之合理在于其必然性之中。而事物发展之必然性不正是客观规律吗?从“四万亿”大投资,经济稳增长中间过渡,再到以城镇化作根本动力源,这五年的经历,表明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版本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必然性”之客观规律上开始摸到一点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一些我们自己的宝贵经验。我们内部曾搞过一个报告会,题目叫作“打造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我们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但它又是不同于日本的东方版本,也不同于韩国的版本。概而言之,东方版本的探索我想总体上还是应以马克思讲的产业资本理论作为基础。我以为今天我们应下大力气研究产业资本问题。

时至今日,全球化的危机问题有所缓解,而我们中国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本身的事业搞好。我觉得李稻葵教授的主张很有道理,就是主要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好。前一年我也谈过这个事情,怎么样真正建立起我们的发展道路,我们的发展实践当中好的东西要能够形成模式。海尔老总张瑞敏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抓模式。张瑞敏教导他的员工说:为什么许多时候同样一个错误犯了下次还犯,就是因为你的经验没有概括成一个足以“正能量”化的模式、模块。

毫无疑问,我们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确实还有待改革、打造,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待探索,有些地方问题很严重。但是不管怎么说,30 年来的实践,特别是 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我们开始从成功尤其是失败中摸索的那些比较重要的、带有引擎性元素的经验,应该是我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据。

唯其如此,2013 年我们要着重提高 GDP 质量,要稳妥地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加大改革红利和重大理论实践的探索;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我不同意市场由政府主导,但是,又要处理好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这二者的关系。成思危先生刚才讲“永远是两个方面”,我很赞同他的这一观点,但是一定要强调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本文系作者在《2013·首都经济管理学界新春联谊会》上作的致辞)

2012:西方不亮东方亮 世界经济复苏步履蹒跚 中国经济转型稳健前行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谢明干

(上接 2 月 2 日 02 版)

(二)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宏观经济基本面依然良好。

就业。前 11 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202 万人,已超过了年初确定的“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000 万人”的目标。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不断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需求,特别是各地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以及东部沿海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新增加了很多就业机会。

物价。全年物价呈逐步走低的态势,主要原因是宏观调控得力,特别是粮食生产实现了“九连增”,大大减轻了国际粮价上涨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也为我们调控物价提供了最重要最基本的物质基础。2012 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呈下降之势,1 月份为 4.5%,6 月份为 2.2%,到 9 月份为 1.9%,10 月份又降到 1.7%。1-11 月平均,全国 CPI 同比上涨 2.7%。预计全年为 3%左右,比 2011 年的 5.4%显著降低,比年初确定目标 4%也降低了 1 个百分点左右。反映生产领域物价变化的工业产品出厂价格(PPI)的同比涨幅,自 2011 年 7 月达到 7.5%的高位之后,就开始了下降的趋势,到 2012 年 3 月出现负增长,9 月为-3.6%。10 月虽仍然是负增长,但已出现回升,比 9 月份回升了 0.8 个百分点。这反映出企业利润周期的拐点已经显现,短期经济正在企稳;也说明行业的景气刚开始恢复,实体经济还需要继续发力。

工农业生产。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领域。自 2011 年 7 月以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就呈振荡式下降之势,到 2012 年 8 月增速降到 8.9%企稳后逐月加快回升,11 月达到 10.1%,预计全年为 1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开始扭转下降的局面,1-10 月同比增长 0.5%,其中 10 月当月同比增长 20.5%。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2012 年粮食生产又获得了创纪录的大丰收,总产量达到 11791.4 亿斤,比上年增产 367

亿斤,实现半世纪以来首次连续 9 年增产,而且是全面均衡增产,即水稻、小麦、玉米全部增产,夏粮、早稻、秋粮季季丰收,面积、总产、单产全面提高。

对外贸易。前 11 个月,进出口总值为 3500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8%,其中出口增长 7.3%,进口增长 4.1%;贸易顺差为 1995.4 亿美元。未能实现年初确定的“全年外贸增长 10%”的目标,其中出口增速下降的原因是:世界经济增速持续下降,外部需求严重不足;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加快;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进口增速下降的原因是: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需求相对不足;有些国家对我们进口高新技术产品设置障碍;价格因素,如 11 月进口同比增长 3%,而价格同比下降 2.9%,使进口金额同比基本不变。2012 年外贸形势有几个新特点:(1)中欧、中日贸易下降,中美、中俄、中国与东盟、中国与巴西的贸易增长。(2)中西部地区的贸易出口值的增幅远高于沿海地区。(3)民营企业成为对外贸易的生力军,进出口总值增幅远高于外贸总体的增幅和国有企业的增幅。(4)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稳定,占出口总值过半(57.2%)。(5)进口方面,能源和资源性产品平稳增长,大豆进口数量增长,铁矿石、铜、铝等进口价格下跌。

(三)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达到或超过年初提出的目标。

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一直在加快,对经济增长仍然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前 11 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20.7%,其中,制造业投资 113196 亿元,同比增长 22.8%,比前 10 个月下降 0.3%;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709422 亿元,同比增长 16.3%,比前 10 个月上升 0.3%;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287332 亿元,同比增长 28.8%,比前 10 个月增长 2.1%;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201624 亿元,同比增长 25%,比前 10 个月下降 0.2%。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前 11 个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86833 亿元,同比增长 14.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12%。消费市场的特点有:(1)呈现 V 型走势。8 月份以前受宏观形势影响小幅回落,8 月份以后企稳回升、



快速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2)城镇消费回升,增速在加快。(3)大中型流通企业销售额增加,增速也在加快。(4)升级换代商品(汽车、家电、建材等)销售额回升。消费回升缘于经济回升、物价回落和居民收入增加,反映出广大消费者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增强了。

居民收入。实现了“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的要求,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9.8%,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 12.3%,均高于 GDP 增长的速度。

财政收支。前 11 个月,全国税收收入为 9.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9.8%,但增幅同比回落 14.9 个百分点。增幅回落,有受大环境的影响,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效益下滑、价格涨幅回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和进口增长放缓等原因,也有结构性减税力度加大的原因。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短期看会出现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的情况,但是可以大大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放水养鱼”,从长期看对经济发展、财政增收大有好处。前 11 个月,全国财政支出为 10.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9%。在年度预算中要求财政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事业等的支持力度增长 20%以上,预计到年底都可以实现。

(待续)

